

「去中國化」與「文化中國」的辯證—— 文化冷戰脈絡下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 《華文》教科書

黃玉君*

摘要

1959 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在美國亞洲基金會的秘密援助下，與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的經理胡家健在馬來亞共同創辦了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成為當時唯一的「非左翼」中小學教科書出版公司。儘管該公司出版的教科書在多所學校得到廣泛使用，但在文化冷戰背景下，其建構的文學教育以至文化身分認同，卻一直備受忽視。本研究結合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收藏的「亞洲基金會」專檔與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為新加坡出版的《華文》中學教科書，追溯友聯出版社與胡家健合作背後的動機，並探討教科書如何在遵循當地教育部「本土化」準則的同時，建構他們對「文化中國」的想像。透過檔案資料，本文揭示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實則為亞洲基金會在東南亞建構「非共」教科書出版計畫的一部分。但通過對教科書中含有馬來亞色彩的教材分析，本文希望指出友聯出版社如何在政治權威與經濟牽制下，呈現文化生產的「第三空間」，進而塑造了海外華人的「華人性」的特點。

關鍵詞：友聯出版社、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華文》、文化冷戰、文化中國、文學教育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

一、前言

友聯出版社（以下簡稱為「友聯」）於 1955 年從香港南下馬來亞（馬來亞聯合邦與新加坡）拓展文化事業，短短四年在創辦的《蕉風》（1955-1999，2002 年由南方大學學院接管復刊）中以「反叛文學運動」的旗幟號召「新詩再革命」，掀起了馬華文學史上第一波現代主義文學思潮。¹ 這一運動在文化冷戰研究的論述下，已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學者普遍關注友聯在美國非政府組織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前身為「自由亞洲協會」〔Committee for Free Asia〕）的秘密資助下，如何與馬華文壇主流位置的左翼現實主義文學觀點進行文化鬥爭，從而培育不少本地作家和詩人，重新主導馬華文學的未來發展。²

然而，友聯在 1959 年創辦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馬化」）出版中小學教科書，參與馬來亞獨立和新加坡自治後的後殖民「知識建構」和「去中國化」的華文教育政策，卻沒有產生相應的研究與論述。「去中國化」為二戰後馬來亞華文教育的制度轉向，由英殖民政府，以及馬來亞獨立及新加坡自治後的當地政府，在冷戰氛圍與建國工程交織的背景下，企圖使華文教育脫離「中國

¹ 張錦忠，〈亞際華語圈的文學流動：論《蕉風》與臺馬文學關係〉，《中山人文學報》第 52 期（2022 年 7 月），頁 3；謝川成，《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1959-1989）》（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9 年）；李樹枝，〈升起現代文藝的大蠱：《蕉風》、余光中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收入張錦忠、黃錦樹、李樹枝編，《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2 年），頁 259-274。

² 莊華興，〈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6 年 4 月），頁 7-30；賴美香，〈美援文化下的馬來亞華文出版界——以五、六零年代友聯出版社為例〉，《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0 期（2017 年 9 月），頁 119-141；許維賢，〈文化冷戰中的「隱形宣傳」：論友聯出版社與《蕉風》在新馬的經營（1955-1970）〉，《二十一世紀》第 193 期（2022 年 10 月），頁 120-141。

特質」與對中國的政治效忠。³ 教科書作為規訓權力的產物，透過構建「知識」的體系，在選擇、過濾、判斷哪些知識應被推廣以及保存的選擇過程中形成「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塑造學生共同的自我認識和價值觀形成。⁴ 至於教科書所選用的文學教材，則在建制化的過程中形成文學典律，影響力比文學刊物更具普遍性和強制性。誠如許經田所言：

文學教育與語文教育是摻雜在一起的，在此階段所養成的文學觀（以及蘊含在作品中的各種價值觀）具有如同語言一般的深入的影響力：事實上對於經歷此種教育的人來說，它提供了一種共同論述，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共同語言。⁵

換句話說，教科書的文學教育除了培養學生的語言和文學的審美能力，也建構一種同質性的文化身分，在文化冷戰的意識形態鬥爭中成為重要的「文化武器」。香港友聯進入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教育體制，正是這一脈絡的延伸，在去殖民化的歷史浪潮中，通過教育的知識傳授與價值引導，試圖實現「非共」的文化再生產和自由的意識形態。

³ 關於「去中國化」在馬來亞文化場域中的意涵，許維賢曾在〈華語語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智強和陳子謙的電影為例〉中解釋為：「個體劃清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還保有自己本土的華人身份認同」，並進一步梳理新加坡社會從「去中國化」走向「去華人性」的歷史再現與其背後的政治脈絡。然而，本文所關注的歷史場景僅限於 1950 至 1960 年代的馬來亞（亦包含新加坡）。當時本地社會對「文化中國」的認同依然深厚，因此，否認血緣與文化層面的華人身份認同，以「去華人性」為指向的論述，於該時期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關於新加坡社會從「去中國化」推進至「去華人性」的歷史脈絡，詳情可參考許維賢，〈華語語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智強和陳子謙的電影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23 期（2013 年 6 月），頁 83-109。

⁴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117-118.

⁵ 許經田，〈典律、共同論述與多元社會〉，《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2 期（1992 年 7 月），頁 21。

相對於中／美、自由／專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對立的冷戰意識形態的簡單化分析，本文更希望探討友聯在馬來亞創辦的馬化作為民營教科書出版社，如何選擇和編排文學作品以體現其潛在的能動性。馬化在政府權威與經濟牽制的夾縫下，教科書對文學作品的闡釋和閱讀，如何呈現文化生產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打破冷戰意識形態的「非此即彼」邏輯？這種「居間」於冷戰邏輯的「第三空間」如何激發學生的新身分符號，建構他們的「華人性」？「第三空間」和「居間」為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後殖民研究文化混雜性的重要理論。⁶ 他對本質主義、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以及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二元對立解構實際上也適於探討馬化在文化冷戰脈絡下的教科書出版和編纂。但有別於霍米·巴巴關注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立關係，馬化的個案更為複雜，涉及冷戰的多重權力結構，如美援、華文教育的中國中心論與本土化政策的對立，以及香港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本文透過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框架，深入剖析友聯在馬來亞的特殊文化定位。巴巴提出的「居間身分政治」與「第三空間」概念，恰能解釋友聯如何在殖民情境的多元交織中，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差異重複」概念。在冷戰時期的馬來亞，友聯既不同於官方強硬的「去中國化」政策，亦有別於左翼陣營對華文教育的堅決捍衛，而是開拓出一種中介性的文化空間。這種曖昧含混的定位，正體現了巴巴所謂「第三空間」的理論意涵。它既非單純的殖民複製，亦非徹底的反抗，而是在文化邊界的不斷協商中，生產出新的意義可能。友聯透過《華文》教科書的編纂，展現了這種文化混雜的創造性過程。教科書中「去中國化」與「文化中國」的並置辯證，並非簡單的二

⁶ 有關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間」和「居間」理論，可參考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和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元對立，而是形成一種動態的對話空間。這種實踐既反映了冷戰知識生產的政治張力，也呈現出文化主體在跨域流動中的能動性。友聯的「中介空間」，最終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成為重新定義馬來亞華人文化認同的重要場域。

如同《蕉風》與《學生周報》（1956-1985）的成立是為了「想在左翼遮天的南洋文壇突圍」，⁷ 馬化的成立則進一步延伸文化冷戰的戰略，遏止左翼或親共教科書出版社壟斷馬來亞學校的中國語言及文學的學習。⁸ 作為亞洲基金會資助的教科書項目，馬化不僅是冷戰地緣政治的產物，更是美援資本滲透南洋知識生產的典型案列。然而，至今有關馬化及其教科書的相關資料研究仍然匱乏，導致新馬華文教育長期侷限於「華社與官方的拉鋸與抵抗」的在地敘事框架，忽視了冷戰全球性因素對教育場域的深層形塑。

有鑑於此，本文將參考近年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重新開放的亞洲基金會專檔資料，追溯馬化的創立過程，並探究友聯與另一位合作夥伴胡家健（1903-2001）的合作關係，揭示美國亞洲基金會如何通過教科書體制在東南亞建立非共文化網絡。然而，軟實力的權力灌輸並非單一化的由上至下，而是牽涉多重角力的複雜網絡。馬化不僅需配合馬來亞教育部的課程標準，還需回應知識分子對文學自由的想像，在政治規訓與美學自主的張力間尋找平衡點。通過分析馬化於1961至1962年間為新加坡中學出版的《華文》教科書中的本土意識選篇及課文排列策略，⁹ 本文嘗試超越冷戰視野的政治格局，重新定位友聯的文

⁷ 白垚，《縷雲前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6年），上冊，頁332。

⁸ Asia Foundation, “Approved Project,”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⁹ 新加坡雖然於1959年被英殖民政府劃為自治區，但地緣文化和教育政策皆與馬來亞緊密聯繫。二戰後的馬來亞在脫離殖民統治，爭取獨立建國所積極提倡的馬來亞意識，實際上

化事業，在剝離美援的標籤後，了解知識分子如何通過教科書編纂，在馬來亞「去中國化」教育政策的夾縫中，迂迴實踐「文化中國」的想像。

二、友聯在馬來亞居間身分政治的形成

（一）友聯對文學自由的想像

本文在探討馬化的成立和教科書分析之前，必須釐清友聯在香港與馬來亞的文化事業，了解其在亞洲基金會的資助下對美國自由世界的權力從屬和反抗，以消解友聯被單一歸類為「綠背文化」和「美援文化」的標籤。¹⁰ 然後，在這一基礎上重新審視友聯在馬來亞的文化事業和其居間的身分政治（Politics of In-betweenness），即強調主體在政治、文化與地理的邊界的夾縫中，通過策略性操作，建構流動性的身分，進而理解友聯在冷戰地緣格局中的文化定位。

友聯出版社在香港成立於 1951 年，為友聯社所創辦，始初成員包括徐東濱（原名許崇志，另有筆名為岳心；1927-1995）、燕雲（原名邱然，筆名為燕歸來；1928-2018）、陳思明（亦名陳濯生，筆名為薛洛；1921-2015）、余德寬（筆名為申青；1922-2010）、史誠之（亦名史剛毅；?-?）和許冠三（1924-2011）。這些成員是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感到不滿的「第三勢力」知識分子，曾組織「民主中國青年大同盟」，後來為了淡化政治色彩而改名為友聯社，意圖「帶着責任感，懷着決心要獻身於共產統治的摧

是包括新加坡的馬來亞。詳情可參考柯思仁：〈想像馬來亞，操演多元文化：五〇年代新加坡華文知識界的馬來亞意識〉，《人間思想》第 1 期（2012 年 7 月），頁 170-190。

¹⁰ 趙稀方，〈五十年代的美元文化與香港小說〉，《二十一世紀》第 98 期（2006 年 12 月），頁 87-96。

毀、和中國民主社會的建立」。¹¹ 友聯的誕生得益於美國在香港的文化冷戰戰略。1950 年代，香港被美國視為「自由世界前哨」的重要宣傳基地。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和各類宣傳機構，在當地展開大規模反共計畫，其中包括資助第三勢力的組織，以協助抵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散。¹² 資助友聯的亞洲基金會便是從屬於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在 1951 年創設的 DTPILLAR 計畫，通過「國家私營網絡」（State-Private Network）的運作模式，方便為美國從事民間的反共活動，通過資助亞洲文化機構實現「反共」或「非共」的文化宣傳。¹³

隨著美國解密檔案的公開，許多學者得以提出實例的論證和觀點，重新審視友聯作為美方在亞洲的「中介」、¹⁴「信息帝國」¹⁵ 以及「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志願兵」等各種論述。¹⁶ 他們強調友聯的行動並非單一的意識形態驅動，而是綜合考慮自身的立場與文化使命。

王梅香、沈雙和傅葆石通過《中國學生周報》和《祖國》兩份

¹¹ 〈友聯出版社——一個追求真理的青年團體〉，引自〈何振亞〉，收入盧瑋鑾、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冊 1，頁 13。

¹² Lu Xun,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1949–1960: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s.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2.

¹³ 有關 DTPILLAR 的相關資料，詳情可參考美國公開的網路檔案，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TPILLAR, https://archive.org/details/DTPILLAR/DTPILLAR%20%20VOL.%201_0001/。

¹⁴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2 卷第 1 期（2020 年 3 月），頁 123-158。

¹⁵ Shen Shuang,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69.3 (2017): 589–610.

¹⁶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第 174 期（2019 年 8 月），頁 67-82。

刊物對美國政策的批評以及檔案資料裡亞洲基金會對友聯的意見，強調友聯獨立自主的位置及與美方的不同觀點。另一方面，許維賢也從檔案資料的梳理和審視中，反駁友聯文化人所聲稱為「絕對獨立自由」的意識。¹⁷ 雖然雙方的論述結論不同，但都不約而同指出友聯的「居間身分政治」，體現友聯文化事業在文化冷戰下與權力從屬的辯證性。

然而，上述學者並未詳細探究友聯成員作為自由主義的文學創作者，與美方的「自由世界」的政治宣傳實際上存在本質上的差異。這些差異不僅體現在「自由」的理解上，也反映在文學創作的方向和目的。友聯的出版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創刊於 1952 年）、《祖國》（創刊於 1953 年）、《兒童樂園》（創刊於 1953 年）和《大學生活》（創刊於 1955 年），它們雖獲得亞洲基金會的資助，但當中的言論更強調個體的自由與人文關懷，因此一些發表的文章與親美的立場背道而馳。¹⁸ 友聯創辦人之一的燕雲（Maria Yen），是推動亞洲基金會資助的關鍵角色，但其與美方的關係卻充滿張力與矛盾。燕雲在《祖國》談及自己在飛往美國的飛機上的經驗，表示：

口渴了，根據過去的經驗，向白色皮膚的空中小姐要一杯涼開水，十分鐘內是不會有消息的，有一次請了她兩次她還說等一等，最後她告訴我說洗手處附近就有。如果我是一個白

¹⁷ 許維賢，〈亞洲基金會在新馬的文化冷戰：以友聯出版社和《學生周報》為例〉，《中外文學》第 52 卷第 2 期（2023 年 6 月），頁 65-113；王延芝，〈漫談「周報」和友聯〉，《星島日報》（1988 年 11 月 1 日），第 10 版。

¹⁸ 例如《祖國》週刊收錄燕歸來，即燕雲於 1957 年探訪美國的歷程和感想，談到美國的種族歧視和差別待遇的現象，與美國文化宣傳的親美目的背道而馳。詳情可參考燕歸來，〈向西飛行——「玻璃幕」之一〉，《祖國》第 22 卷第 4 期（1958 年），頁 27-29；燕歸來，〈黑白分明——「玻璃幕」之五〉，《祖國》第 22 卷第 8 期（1958 年），頁 26-29。

色皮膚的男子，向她要一杯香檳是否很快就可以喝到呢？¹⁹

根據解密的亞洲基金會專檔資料顯示，這段話遭美國新聞處譴責，被指燕雲對空服人員的推論和假設為「過於情緒化」和「幼稚」。為此，燕雲堅定捍衛自己作為文學創作者的身分及權利，強調真實的情感流露與思想傳遞其實同樣重要：

老實說，我沒有足夠的自信否認我作品中情感因素的存在，因為它們是文學寫作，而不是科學研究或報告。（我希望您同意我的看法，寫報告和寫散文是很不一樣的。）在文學寫作中表達真實的感受和情感，與提出想法和判斷一樣重要。²⁰

燕雲也明確指出自己的寫作，並非旨在加深東西方之間的誤解，而是希望讀者能直面甚至超越政治層面的現實挑戰。²¹ 這一事件凸顯了友聯創辦者縱使在受資助情況之下對自身創辦刊物的定位，更透露了文學創作中的抒情表達與外部政治壓力之間的張力。燕雲的堅持不僅體現了個人對文學真實性的追求，也反映了友聯在冷戰語境下對自由表達的堅持以及與美方立場的衝突。燕雲作為主動尋求美方資助卻堅持刊物獨立的文化實踐，²² 解構亞洲知識份子「綠背文化」體系中視為被動接受美方要求的認知模式，以及接受資助意味妥協的簡化認知，揭示文化冷戰美方與亞洲文化機構的

¹⁹ 燕歸來，〈向西飛行——「玻璃幕」之一〉，頁 27。

²⁰ Maria Yen, to Robert Clarke, “Letter from Maria Yen to Robert Clarke,” 1958; MS no. P-169, Yen Maria, Hong Kong, Individual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原文為 “I don’t honestly feel confident enough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emotional factors in my works, because they are literary writings instead of a pie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r a report. (I hope you agree with me that writing a repor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doing a prose.) To express your genuine feelings and emotions in a literary writing is as important as bringing out your thoughts and judgment.”

²¹ Maria Yen, to Robert Clarke, “Letter from Maria Yen to Robert Clarke,” 1958.

²² 〈奚會璋〉，《香港文化眾聲道》（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冊 1，頁 65。

複雜協商空間。

此外，友聯也成立編譯所出版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勞思光（1927-2012）等新儒家學者的學術思想書籍和教材系列《友聯活葉文選》，以推廣文化和文學教育。友聯為此對自己有個清晰的文化定位：

求使友聯出版社成為一個多方面的精神糧食的供應站，對海外的廣大中國讀者，對各地有興趣了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讀者，竭力提供最大的文化服務。²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出版物並不屬於亞洲基金會的資助項目，²⁴ 而是友聯在文化冷戰戰略框架之外的獨立嘗試。與此同時，為了擴展友聯的業務，燕雲曾到訪新亞書院拜訪父親的好友，著名學者錢穆（1895-1990），並請他推薦學生加入友聯。²⁵ 這一舉動在無形中奠定友聯與新亞之間的精神聯繫，即繼承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

雖然新亞書院與友聯同樣接受美國的資助，但美國在亞洲的文化策略會根據不同地域制定不同方案。在香港，美國通過資助新亞書院弘揚儒家傳統文化，試圖建構對抗中共意識形態的文化堡壘。²⁶ 但另一方面，美方在東南亞地區的宣傳策略卻轉而促進海外華人融入當地社會，以削弱他們與中國的聯繫。²⁷ 在此背景下，友聯在馬來亞的文化實踐實際上突破了美國的地域差異性策略，在教科書出

²³ 〈關於友聯出版社的書刊出版工作〉，《友聯出版社圖書目錄》（香港：友聯出版社，1960年），頁1。

²⁴ 〈何振亞〉，《香港文化眾聲道》，冊1，頁25；〈林悅恆〉，《香港文化眾聲道》，冊1，頁178-179。

²⁵ 〈奚會璋〉，《香港文化眾聲道》，冊1，頁52-54。

²⁶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73。

²⁷ 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頁74-75。

版方面，表面遵循「馬來亞化」的政策要求，卻通過經典文選維繫文化傳承，既不完全屈從於資助者的政治議程，也不公開牴觸當地文化政策，而是在各方力量的博弈縫隙中，開拓文化自主空間。

（二）作為「非共」的文化機構

根據英國學者哈克（Karl Hack）的研究，馬來亞於 1948 年宣布「緊急狀態」被視為亞洲冷戰的起源，揭示冷戰意識形態在東南亞的蔓延。²⁸ 與此同時，香港友聯南下馬來亞的文化活動，則成為國際冷戰在文化領域的戰略延伸。友聯南下馬來亞的計畫，背後是亞洲基金會慎重評估後，與英殖民政府合作的結果。²⁹ 這一計畫也受到友聯的高度重視，動員了包括燕雲、徐東濱、陳思明和余德寬在內的友聯社成員集體投入，並與當地亞洲基金會的負責人展開秘密交涉。³⁰

相對於香港英殖民政府通過嚴格取締民間和教育的政治活動而獲得制衡效果，馬來亞在 1950 年代的情況則截然不同。馬來亞聯邦計畫以及一系列壓制華校的教育法令和報告書，引發了多次工潮和學生運動。儘管英殖民政府以武力鎮壓，這些運動卻愈演愈烈。英殖民政府將這些學生運動視為「共黨陰謀運動」，³¹ 也使友聯格外重視教育場所的文化宣傳。

二戰後的馬來亞華文教育，在馬來亞緊急狀態的劇烈氛圍與新

²⁸ Karl Hack,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old War: Malaya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0.3 (2009): 471–496.

²⁹ Frank G. Wisner, "Memorandum for: Project Review Committee (Subject: CFA budget for FY-195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TPILLAR*, vol. 2_0034, 1954, 4. https://archive.org/details/DTPILLAR/DTPILLAR%20%20VOL.%202_0034/, accessed March 5, 2025.

³⁰ 〈奚會璋〉，《香港文化眾聲道》，冊 1，頁 60。

³¹ 曹淑瑤，〈1950 年代馬來亞的華校學生運動之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2013 年 6 月），頁 311。

興民族主義情緒的雙重打擊下，華文學校被視為政治威脅而遭到政府的壓制和歧視。無論是 1951 年的《巴恩報告書》抑或是 1952 年的《方吳報告書》，都致力消除中國對馬來亞華人的影響，積極倡導「去中國化」的教育制度。然而，這種極端的政策不僅加劇華社的不滿，成立「馬來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捍衛華文教育，與官方政府在制定華文科目的課程標準上爭取對中華文化的保留，更為馬來亞共產黨提供了滲透校園的機會，使得校園成為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場域。友聯的南下活動在馬來亞文壇中形成了一種「另類」和「反叛」的存在。自 1927 年大量左翼文人因國民黨清黨南渡之後，革命文學思潮被引入，主導了馬華的文學場域。³² 即使延續了 20 至 40 年代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文學爭論，探索的核心依然是左翼文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張力。³³

因此，友聯在馬來亞出版的文學刊物《學生周報》與《蕉風》，以「非共」的立場，象徵著對文學場域的轉向企圖。《蕉風》的發刊詞「蕉風吹遍綠洲」，以拓墾者的身分自居，明確否定了之前的文學耕耘，展現出新的文學方向和理念。無論是 1955 年「純馬來亞文藝」到 1959 年「純文藝」的改版，友聯始終堅持文學的純粹性，試圖消解文學中的政治議題討論。

然而，解密的亞洲基金會專檔資料透露，由於友聯在馬來亞文壇屬於「另類」和「反叛」的文化機構，其出版的刊物《學生周

³² 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新加坡：萬里書局，1974 年），頁 52。

³³ 有關「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戰與左翼的關係，可參考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檳城：韓江學院，2009 年），頁 130-144。根據謝詩堅的研究，「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爭背後，實為中共與馬共的分歧，借著文藝之爭，變成中國革命與馬來亞革命之間的角力。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論爭始末，詳見當時身為論爭當事人之一的苗秀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理論》所寫的導論，新社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纂，苗秀編選，《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理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 年），頁 13-20。

報》曾遭受親左翼立場的學生抵制，甚至有群眾到友聯舉辦的野餐會進行干擾，擔任《學生周報》的學生通訊員也遭受攻擊，撕毀刊物。³⁴ 為此，友聯在馬來亞不以「反共」的姿態自居，而是避開政治立場，專注於促進「非共」的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強調思想的自由交流。即便如此，《蕉風》依然刊登不少反共的輿論，批判左翼的政治工具論文學觀，並設「萬里望」和「文訊」等版位，報導大陸文壇的局勢，揭示作家在大陸受政治打壓的處境以批評其獨裁的統治。

友聯在馬來亞的遭遇和策略的調整正反映其在左翼文壇夾縫中的「間隙」和策略調整。友聯的「非共」也表現在不與國民黨有所牽連。例如，余德寬便不想被認為是國民黨而拒絕了《中興日報》總編輯陳振亞邀請他在學校演講的提議。³⁵ 這種「居間身分政治」使友聯在馬來亞的文化活動試圖保持獨立性，又不得不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尋找生存空間。友聯的策略調整，不僅顯示了冷戰時期文化政治的複雜性，也展現了其在左翼文學主導的場域中試圖開闢新路徑的努力。

此外，友聯作為「他者」來到馬來亞，需通過結識當地華社的領袖與知識份子，才能從邊緣的外來者身分融入本土社群，甚至扮演文化的引領者。因此，余德寬赴馬來亞視察時，積極與當地教育界菁英和社團領袖建立交情。由此，《蕉風》得以獲李汝琳（1914-1991）、馬摩西（？-1971）和蕭遙天（1913-1990）等文化界人士的長期支持。友聯的離散身分在流動性中體現了霍米·巴巴所言的

³⁴ Asia Foundation, "Attacks on the Union Press," 1958/59; MS no. P-172, MEDIA Publishers Union Press General, Hong Kong,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³⁵ Yu Tak-foon, "Excerpts from Mr. Yu Tak-foon's Letters from Singapore (translation)," 1957; MS no. P-57, MEDIA Publications Chinese Student, Hong Kong,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離家」(unhomed) 狀態，³⁶ 但卻是策略性地認同馬來亞本土意識，思維並不受特定地域與時間的限制。而友聯成立的馬化進一步凸顯其在多重權力結構中的中介角色。

它不僅作為文化冷戰的代理人介入本土教育體系，還通過吸納本地教育政策，在建國時期與知識份子的參與和冷戰地緣政治之間進行文化協商，建構一個動態的「第三空間」。這種「第三空間」指的是在文化交匯與權利結構中產生的混雜性場域，通過差異與衝突中生成新的意義場域，強調多重文化身分在交織中的動態性與創造力。

三、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與東南亞非共教科書網絡

1959 年，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在吉隆坡正式成立。這是友聯經過兩年精心籌備的項目，也是亞洲基金會致力於東南亞地區推動非左翼教科書的關鍵舉措之一。³⁷ 根據亞洲基金會的評估，東南亞華文學校的教科書長期受左翼出版社的壟斷，導致學生接受左翼政治色彩的影響，因此迫切需要一個能夠長期解決華人教育問題的教科書方案。³⁸ 同樣情況也發生在馬來亞，教科書主要由「五大書局」即商務印書館（創立於 1915 年）、中華書局（創立於 1917 年）、世界書局（創立於 1924 年，前身為正興公司）、上海書局（創立於 1925 年）和南洋書局（創立於 1935 年）。當中商務印書館、中華書

³⁶ Homi K. Bhabha, "The World and the Home," *Social Text* 31/32 (1992): 141–153.

³⁷ Asia Foundation, "Conversation with some Union Press Friends from Singapore," 1957;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³⁸ USIS/ICA/TAF, "Summary of Discussion-Coordination Meeting USIS/ICA/TAF," 1956/57; MS no. P-57,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Hong 2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局為上海的海外分行，而上海、世界和南洋書局則在新加坡創立，於戰前便從事教科書批發，發行中國進口的教科書。這五家書局曾於 1951 年和 1957 年兩度合作，成立聯營出版社與教育供應社，通過資源整合與市場協作，在教科書市場取得顯著營利，並成功進入多所學校的供應體系。其市場影響力與商業模式，被友聯和亞洲基金會視為潛在威脅，成為推動非共教科書網絡佈局的重要動因之一。

曾任香港上海書局編輯的李怡揭示，五、六十年代新加坡華文書局普遍具有左傾傾向，其出版發行的刊物和書籍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導向。³⁹ 以香港上海書局為例，該書局實為新加坡總店為突破殖民當局對大陸出版物的禁運而設的轉口樞紐，通過「香港印行」的技術處理如更改版權頁信息，將大陸出版物轉化為「香港版」向東南亞地區流通。這種出版實踐背後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左翼文化網絡。書局不僅與三聯書店保持密切的統戰關係，其作家陣容和選題更直接受官方指導，集中出版經北京認可的田漢（1898-1968）、夏衍（1900-1995）與葉聖陶（1894-1988）等，並延攬《大公報》、《文匯報》等左派報刊的編輯。⁴⁰ 這種資本結構、內容生產到發行渠道的左翼網絡，與友聯的文化定位形成鮮明對比。作為馬來亞華文出版界的特殊存在，友聯是當時唯一專門經銷臺灣出版物的書店，其圖書選品和編輯方針明顯傾向反共立場。

冷戰時期，美國支持的非左翼教科書網絡，本質是將教育系統轉化為「反共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場域，以對抗共產主義在東南亞

³⁹ 李怡口述，章星虹訪問，〈上海書局是我的成長搖籃——上海書局前編輯、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家李怡談早年於香港上海書局的編輯工作〉，載章星虹，《星州星光：現代旅人手記》（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6 年），頁 331。

⁴⁰ 楊善才口述，章星虹訪問，〈「香江來書」，實際上是「星州出品」——前星洲世界書局職員、新華書局老板楊善才談星洲世界書局當年的門市及經銷運作〉，收入章星虹，《星州星光：現代旅人手記》，頁 297。

的擴散。但教科書的出版需要依賴地方層面的「中介」角色。因此，香港友聯作為美國的亞洲中介，來到馬來亞也需要倚賴熟悉當地教育體系、文化語境與政治環境的本土行動者，構成「雙層中介」結構。這種結構不僅體現文化冷戰的佈局，也揭示了多重權力結構之間的拉鋸與相持。

余德寬作為友聯的代表，初到馬來亞時，便深入考察當地華文教育現狀，尤其關注華校和學生運動的動態。他通過拜訪教育部、訪問規模較大的華校，逐步建立起與地方教育領袖的聯繫。⁴¹ 其中，他結識了在鍾靈中學執教的蕭遙天，並在馬華公會總秘書梁宇皋（1888-1963）的引介下，與政府官員建立交情，甚至獲得教育部長的支持出版中小學的教科書。⁴² 這種地方網絡的建構為友聯在馬來亞推動非左翼教科書出版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此之前，友聯將香港出版的《友聯活葉文選》發行到馬來亞作為市場測試，隨後經改編為星馬版，成功獲得當地多所學校的採用，並且為鍾靈中學和新文龍中華中學編訂合訂本，成為學生的國文課本。⁴³ 由此可見，友聯必須透過雙重的在地策略，既調整教材內容以契合本土化的教育政策，以及與地方教育機構建立合作，才能有效滲透當地市場。

這一成功的市場測試，為友聯在當地成立教科書出版社奠定了信心。然而，馬化是在胡家健的加入下，進一步發展為東南亞「非共知識共同體」的重要教科書網絡節點，成為冷戰時期文化戰略的

⁴¹ Yu Tak-foon, "Excerpts from Mr. Yu Tak-Foon's Letters from Singapore (translation)," 1957.

⁴² 方美富，〈蕭遙天與五八年「華文」課本誕生〉，《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1 期（2018 年 9 月），頁 48；Asia Foundation, "Textbooks for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⁴³ 〈友聯活葉文選特殊合訂本〉，《友聯出版社圖書目錄》，頁 28。

關鍵一環。胡家健原為香港集成圖書公司（以下簡稱「集成」）的經理，該公司是臺灣國民黨黨營機構正中書局設於香港的子公司，主要負責出版物的海外發行，並接受亞洲基金會的貸款，專事東南亞華校教科書的出版。胡家健兼具教育家與出版家的雙重身分，早年於中國大陸曾任中學、大學校長及教育部職務，累積逾二十年教學經驗與近十年教科書編纂資歷。⁴⁴ 他在1949年移居香港後，於1955年至1957年間為泰國、柬埔寨、越南和印尼等國的華校策劃出版教材，展現其「文化網絡構建者」的跨國行動力。⁴⁵ 他與當地華校的教育家和領袖緊密合作，針對教科書內容提供編輯建議，確保其契合當地文化語境與政策需求，以融合本土風俗、強化公民教育呼應民族主義思潮。

這段經驗不僅使教科書獲得政府與華校的認可，更為亞洲基金會後續的東南亞教科書出版計畫確立關鍵準則，如（一）建構在地化編纂機制，成立由當地教育工作者與領袖組成的「教科書委員會」，負責內容審核；（二）教材需支持本土民族主義，強調公民責任；（三）盡一切努力爭取官方對教科書的正式批准。⁴⁶ 胡家健的跨國教科書出版經驗，使他成為連結東南亞各國教科書出版網絡的樞紐型行動者。值得注意的是，胡家健雖然任職於正中書局，但其身分更偏向專業出版人而非政治宣傳者。根據解密的亞洲基金會專檔資料，他在東南亞的教科書出版項目被賦予較大的自主權，並未

⁴⁴ Hu Chia-chien, to Patrick Judge, "Letter from Chia-Chien Hu to Patrick Judge,"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⁴⁵ Asia Foundation, "Textbooks for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58; Asia Foundation, "Hong Kong Meeting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1956/57; MS no. P-57,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Hong 2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⁴⁶ USIS/ICA/TAF, "Summary of Discussion-Coordination Meeting USIS/ICA/TAF," 1956/57.

強制要求植入國民黨意識形態。⁴⁷ 因此這也解釋友聯與胡家健合作的可能性，並沒有與其居間的身分政治起衝突。

胡家健於 1957 年實地考察馬來亞與新加坡的教科書市場，與友聯一樣有意為當地華校出版教科書。⁴⁸ 為避免資源重疊與市場競爭，雙方協議合作成立教科書出版公司，由亞洲基金會提供貸款支持，並以利潤均分模式達成利益平衡。⁴⁹ 雙方的合作也因此標誌著文化冷戰網絡的區域整合。

此外，胡家健的加入強化了馬化的運作能力，更為其帶來了深厚的教育人脈與市場經驗。他在大陸任教期間，曾教授許多後來成為友聯成員的學生，例如他曾是王健武的中學老師，也是陳思明和何振亞在中央大學時期的導師。⁵⁰ 白垚在其自傳式小說中提到胡家健擁有廣泛的人脈網絡，許多馬來亞華校教師都曾是他的學生。⁵¹ 憑藉這層師生關係，胡家健走訪當地多所學校，與校長和教師溝通，成功推銷馬化的教科書。他的參與也使馬化成為冷戰時期東南亞非共教科書網絡的重要節點。為確保教科書的質量，馬化特別組建跨地域的專家編纂團隊。該團隊匯聚港臺兩地頂尖學者，包括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國學大師錢穆負責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臺灣

⁴⁷ Asia Foundation, "Proposal for Publication of Textbooks for Chinese Schools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⁴⁸ Asia Foundation, "A Trip to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6/57; MS no. P-57,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Hong 2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⁴⁹ Asia Foundation, "Contract of Agreement,"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⁵⁰ 〈王健武〉，《香港文化眾聲道》，冊 1，頁 155。

⁵¹ 白垚，《縷雲前書》，上冊，頁 249。

師範大學地理主任沙學浚（1907-1998）主持初中地理教材編寫；前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丁驥（1913-2000）擔綱高中地理教科書的編纂工作。⁵² 這三位學者同時參與泰國教科書的編輯工程，由此形成一個以港臺學術資源為核心的東南亞華文教育體系的跨國知識網絡。⁵³

馬化以低於市場的定價與高品質教科書搶佔教科書市場，在短短四年間（1959-1963），將市場份額從 19% 提升至 93%，幾乎壟斷馬來亞華校教科書供應。⁵⁴《南洋商報》對此有高度評價：

因其編纂審慎，內容精確，甚獲教育界人士好評，本邦多數的華文中學，已均採用該「馬化版」課本。新加坡部份華文中學亦採用該版課本，甚至遠至北婆羅洲亦有多間學校採用。砂朥越教育部且指定「馬化版」中學華文及各華文輔助科為通過課本，推荐各校採用，使「馬化版」教科書建立了國內外的聲譽，為本邦華文文化放一異彩。⁵⁵

馬化於 1959 年也在新加坡另設分公司，以「新加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⁵⁶ 的商號針對中學教育需求，率先編纂「公民」與「倫理」兩科教材，⁵⁷ 並在新加坡教育部於 1961 年頒布新課程標準後，為當地中小學出版教科書。

⁵² Hu Chia-chien, to Patrick Judge, "Letter from Chia-Chien Hu to Patrick Judge," 1958.

⁵³ Hu Chia-chien, to Patrick Judge, "Letter from Chia-Chien Hu to Patrick Judge," 1958.

⁵⁴ Malaya Press Ltd, "Summary of Progress of Malaya Press Ltd Textbooks Programs," 1956–1963; MS no. P-322, Union Press Organization, General Review,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⁵⁵ 〈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各科小學課本年底全部出齊〉，《南洋商報》（1960 年 9 月 23 日），第 15 版。

⁵⁶ 儘管馬化以「新加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之名在新加坡運作，筆者在翻閱其為新加坡中學出版的教科書時，發現部分教材版權仍標示「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商號，反映商號混用的現象。

⁵⁷ 〈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精良課本・供應華校採用新加坡分公司編公民及倫理課本〉，《南洋商報》（1959 年 12 月 3 日），第 7 版。

儘管馬化的成立是美國在東南亞建構非共教科書網絡中的關鍵佈局，但教科書的編纂策略卻暗含編輯的潛在能動性，並在與多重權力結構如美國冷戰戰略、地緣政治和華人社群認同的拉鋸中形成獨特的「居間身分政治」。而馬化出版的《華文》教科書便是以《友聯活葉文選》為藍本，從「作者介紹」、「題解」、「正文」到「註釋」與「問題」設計近乎完全複製，不少課文也重複出現。因此，透過對《華文》課文篇章的選擇、註釋及教材排列，可窺探友聯潛在能動性與其在多重權力結構中的拉鋸所形成的「居間身分政治」。這也形成了教育政策的「去中國化」與「文化中國」的辯證，塑造了學生處於「第三空間」的「華人性」。

四、《華文》教科書對「去中國化」的積極性與內在衝突

方美富曾於〈蕭遙天與五八年「華文」課本誕生〉一文中，指出馬化的《華文》由蕭遙天獨自編纂。⁵⁸ 雖然他忽視了《華文》與《友聯活葉文選》之間的關聯，卻提供了蕭遙天為《華文》編輯委員之一的重要訊息。得益於蕭遙天的協助，《華文》的選篇增加不少《友聯活葉文選》所沒有的關於南洋風土的篇目，從而更好地適應當地的地緣政治。

《華文》作為「文選型」的教科書，偏重於文學的教材以及培養學生的文學創作力。例如，在陳醉雲（1895-1982）的〈蟬與螢〉課文中，討論項目要求學生「試以『蚊與螢』為題，寫一篇散文」，巧妙地結合馬來亞的氣候和常見昆蟲，讓學生從個人生活體驗出

⁵⁸ 方美富，〈蕭遙天與五八年「華文」課本誕生〉，《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1 期（2018 年 9 月），頁 49。

發，鼓勵他們實踐文學創作。⁵⁹ 同時，教科書中包含多篇朱自清（1898-1948）的散文作品，讓學生借鑑作者的寫作風格進行創作。此外，教科書在翻譯法國著名小說家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小說〈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的課文中，不僅討論國家與個人的關係，還結合文學史的知識，介紹歐美小說到大陸的傳播和影響，進一步解釋短篇小說的體裁和創作。⁶⁰ 諸如此類的問題和題解在其他課文中也頻繁出現，反映了《華文》對培養學生文學知識的重視。

然而，教科書所提供的題解和討論項目卻限制了文學作品的多樣性解讀，往往引導學生朝向特定和單一的思考方向。《華文》在遵循教育部培養學生的本土認同的方針時，所採用的相關課文卻以中國為本位的視角「觀看」馬來亞的風土民情，模糊了「去中國化」的教育目的。同時課文的排列在「文化中國」與「南國」之間擺動，導致馬來亞的「華人性」身分長期處於動態、持續且充滿爭議的建構過程中。

（一）學科命名的本土化

馬化為新加坡中學出版的《華文》教科書，與 1961 年新加坡教育制度改革密切相關。當局從之前沿襲中國的三三學制（即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轉而採用與英文中學接軌的四二學制（即四年中學和兩年大學先修班），以回應當地升學就業需求，也體現教育本土化的政策導向。⁶¹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新馬兩地在 1965 年前被視為是

⁵⁹ 陳醉雲，〈蟬與螢〉，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新加坡：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1965 年），冊 1 下，頁 98。

⁶⁰ 都德著，胡適譯，〈最後一課〉，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1 下，頁 149。

⁶¹ 〈中學採行「四二」制後華校教總極關注日內或會發聲明〉，《南洋商報》（1961 年 10 月 7 日），第 5 版。

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自 1955 年試行自治以來，新加坡便致力於建立獨立的教育體系，1956 年發布的《教育白皮書》強調統一各語言源流學校的標準，因此 1961 年的學制改革統一華校與英文學校的學制，不僅將華文教育正式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更重構殖民時期的教育制度。與此同時，獨立建構時期的新馬兩地在學科命名上也經歷了從「國文」到「語文」政治教育與「中文」和「華文」並存的轉變。這種命名政治實際上折射出文化認同與國家建構的複雜互動。

換言之，學科名稱的改變消解了馬來亞華人的國族認同，轉向語言作為學習和溝通的功能，更標誌著華人在居住地的自我定位。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時，確立了馬來語在憲法上的「國語」地位，與華校教科書使用的「國文」名稱形成語義和政治上的衝突，因此必須修改學科名稱。教育供應社就曾在 1958 年編輯《語文精讀課本》。然而，改換後的名稱依舊隱含特定的意識形態。「語文」一詞實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取代「國語」的教科書名稱。⁶² 1950 年北京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在「編輯大意」解釋「語文」的教育目的：

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要通過語文科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不能單靠幾篇說理的論文。一種思想內容或一個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說理的論文來表達，也可以用一篇小說，一首詩歌，一個歷史故事，或者一個自然科學故事來表達。無論用哪一種文章來表達，都要注意到適合學生的程

⁶² 萬恆德、騰碧城編，《中學語文教學概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1。

度，讓他們領會得到，消化得了。⁶³

由此可見，「語文」這一名稱蘊含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因此在馬來亞和新加坡，上海書局出版的《語文》以及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聯合出版的《初中語文》作為取代《國文》的名稱，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馬來亞的教育準則，卻依舊沒有符合「去中國化」的政策。而馬化也出版《初中語文法則》，刻意消解其作為思想的教育意涵，主要教導語法和語言的性質、標點符號、句子構造及變化，為「語文」一詞構建新的含義，並以「華文」取代之前的「國文」。

「華文」與「華人」成為馬來亞邁向獨立和建國時期普遍使用的詞彙，蘊含重要的象徵意義。它代表了「華僑」轉向「華人」的身分轉變，體現了「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變化。「華僑」作為 19 世紀末形成的概念，將海外華人建構為中國國民的海外延伸，強調其對祖籍地的政治歸屬與文化忠誠。⁶⁴ 但二戰後東南亞相繼獨立，建立獨立國家，加上 1955 年的萬隆會議上，中國宣布廢除雙重國籍政策，迫使海外華人必須作出明確的國籍選擇，使得「華僑」概念逐漸被具有在地性的「華人」表述所取代，在身分上不再指向中國的國民身分。⁶⁵ 然而，「華人」、「華文」和「華語」並非源自於海外華人地區，卻在二戰後成為普遍使用的詞彙。張從興在〈「華人」「華語」的定義問題〉中追溯該詞義的演變，強調「華人」與

⁶³ 宋雲彬、朱文叔、蔣仲仁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年），冊 3，頁 1。

⁶⁴ Wang Gung-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in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81), 118–127.

⁶⁵ 崔貴強，《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修訂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頁 285-287。

「華語」的現代意義。⁶⁶ 他表示「華」的原意是指涉居住在中原地區的華夏族，相關文獻可見於《左傳·定公十年》中的「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作為漢族與非漢族的華夷辨識，但到了清朝時期卻指向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對立，以「華人」作為「洋人」的反義詞。

然而，「華人」一詞到了民國年間卻逐漸不再使用，而是在民族國家的興起下，統稱為「中國人」。「華人」反而在另一個空間，即海外華人地區出現並賦予新的意義。黃錦樹在討論「華僑」、「華人」以及「中國性」與「華人性」的概念時，則指出從「中國人」到「華僑」再到「華人」或「華裔」的身分轉變是一種「淨化」的歷史過程。⁶⁷ 在這一過程中，被去除的是所謂的「中國本質」，特別是對「中國」的政治效忠。換句話說，「華語」和「華文」的形成也是一個去除「政治本質」、保留「文化本質」的「淨化」過程。而馬化的《華文》教科書便是順應當地的地緣政治，相對於其他競爭對手如教育供應社將學科命名為《中文精讀》，以呼應官方資料和成績冊的學科名稱，其立場更貼近本地化的發展方向。隨著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之後，教科書的學科名稱統一使用「華文」，即便在1979年，教育部實施教育改革，統一四種源流學校的教育體系和教科書，「華文」這一名稱仍被保留。

（二）《華文》的馬來亞色彩的選篇

新加坡教育部於1961年頒布中小學各科的課程標準和目標，當中有一條為「培養學生效忠本邦之意識，及與各民族和諧共處之精

⁶⁶ 張從興，〈「華人」「華語」的定義問題〉，《語文建設通訊（香港）》第74期（2003年6月），頁19-25。

⁶⁷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年），頁55。

神」反映本土認同的重要性。然而，作為剛自治不久以及本地作家相對匱乏的情況下，要找尋有效培養馬來亞意識，即與馬來亞歷史、政治、文化相關主題的文學作品並不多。因此，馬化於 1961 年和 1962 年為新學制四學年之中學一至四年級編纂的課文中，僅有 15 篇關於新加坡和馬來亞主題的文學作品。這在 228 篇的課文中，佔據極少的比例。以下為《華文》教科書有關新加坡和馬來亞相關主題的課文列表：

表一：《華文》教科書中新加坡與馬來亞主題課文

教科書	作者和作品
華文 冊 1 上	第 14 課：郭嵩燾〈新加坡洪家花園記〉 第 25 課：魯白野〈馬來亞民族英雄漢都亞〉
華文 冊 1 下	第 9 課：魯白野〈談馬來亞的歷史〉 第 25 課：謝冰瑩〈太平山遊記〉
華文 冊 2 上	第 7 課：蕭乾〈四城記〉
華文 冊 2 下	第 19 課：狄克遜著、楊啟明譯〈砂勞越的森林〉 第 20 課：郁達夫〈馬六甲遊記〉
華文 冊 3 上	第 1 課：〈馬來亞之歌〉——薛洛〈馬來亞的黎明〉、姚拓〈我愛馬來亞〉 第 6 課：郁達夫〈檳城三宿記〉 第 7 課：吳進〈熱帶三友〉
華文 冊 3 下	第 14 課：許雲樵〈「馬來亞建國史」序〉 第 22 課：曾鐵忱〈馬來漁船的下水禮〉
華文 冊 4 上	第 1 課：李鍾珏〈新加坡風土記〉 ⁶⁸
華文 冊 4 下	第 10 課：謝清高《海錄》〈百多年前馬來亞印象記〉 第 11 課：許雲樵〈中國古籍中的馬來亞〉

上述課文的作者群體包括定居於本地的作家、晚清名士、以及曾在當地短暫居住的知識分子。文體包含歷史散文、記敘散文或遊

⁶⁸ 李鍾珏，〈新加坡風土記〉，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新加坡：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1962 年），冊 4 上，頁 4。

記散文。當中郭嵩燾（1818-1891）〈新加坡洪家花園記〉、李鍾珪（1854-1927）〈新加坡風土記〉和謝清高（1765-1821）《海錄》〈百多年前馬來亞印象記〉皆為晚清時期中國文人的作品，紀錄馬來亞和新加坡早期的風貌，從「他者」的眼光觀察當地的風土民情，紀錄的景象和物產都具代表性。例如〈新加坡風土記〉中描述新加坡的氣候、風景和物產，讓學生在閱讀和學習中產生熟悉感而建立他們對居住地的情感認同與歸屬感。教科書的問題討論也讓學生思考課文所紀錄的新加坡早期風貌與他們當前居住的差異，試圖通過「時空並置」與「經驗連結」深化學生對當地的「地方感」，從而得到「本地化」和「去中國化」的教育目的。

然而，教科書的註釋卻隱含對「文化中國」的維護。例如為課文記載的水果之一「波羅蜜」增添註釋時，引用的是馬歡在《瀛涯勝覽》對波羅蜜的口感形容，試圖拉近學生與傳統文化的距離，激發他們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興趣。⁶⁹ 教科書的註釋功能除了解釋詞義和傳遞知識，也透露編輯的教育目的，通過知識的建構機制，塑造學生的認知框架、價值取向和身分認同。因此，教科書將學生熟悉的「波羅蜜」作為「文化中國」的延伸載體，不僅是語言層面的解釋，也是隱晦的文化政治實踐。

〈新加坡風土記〉為中學四年級教材，教科書以古典文學的文言篇目以及思辨性強的散文為主。此時的 16 歲青少年在認知發展上已逐漸深化，具有獨立和批判性思維。因此，教科書繼李鍾珪的篇目後，隨即引入梁啟超（1873-1929）的議論文〈論自治〉，闡述「自治」作為個體與國家的雙重意義，強調自由、平等、獨立和自主對集體與個體的重要性。課文的主題實際上也呼應新加坡作為自

⁶⁹ 李鍾珪，〈新加坡風土記〉，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4 上，頁 3。

治邦的當下現實。⁷⁰ 但弔詭的是，儘管自治邦被授予管理內部事務的自主權，外交和國防依舊由英國控制，在實質上仍受制於宗主國的「隱性主權」。因此，〈論自治〉作為教材在新加坡權力轉交的過渡時期具有高度的自覺意識，通過梁啟超對「群治」與「個體責任」的辯證，回應新加坡邁向獨立的展望，參與公民意識和覺醒個人自由與自治內涵的重要性。在這個過程中，馬化也得以實現其文化啟蒙精神的任務，在教育建制化的體系中灌輸學生對「不自治則治於人」的認知，強調自主權的重要性。

這篇課文源自於《友聯活葉文選》的第 542 篇目，無論是「作者介紹」、「題解」和「分析」均與《華文》一致，充分體現友聯在文化冷戰脈絡下的信息傳播策略。然而深入剖析文本的內涵，卻已超越冷戰的二元對立思維，不僅是抵抗左翼煽動力量的支配，而是通過理性思辨與道德自律，擺脫形式上的意識形態支配，從而實現心智的獨立。

（三）南來知識份子的本土書寫

除了晚清文人書寫關於馬來亞和新加坡題材的散文外，三十年代文人南下紀錄馬來亞和新加坡的遊記和研究也收錄在《華文》中。郁達夫（1896-1945）和許雲樵（1905-1981）各有兩篇作品被收錄為教材課文。作為「中國南洋學會」（簡稱「南洋學會」）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他們共同創立東南亞最早研究南洋課題的學術團體，並創辦《南洋學報》。學會創立初期以傳播中國文化到南洋為目

⁷⁰ 英國於二戰後恢復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對於海峽殖民地的編制進行了調整。在這個過程中，英國將新加坡從海峽殖民地劃出，並將其納入直轄殖民地體制之下，使其與馬來亞聯合邦分隔成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新加坡後來於 1957 年與英國達成協議，獲得自治地位，並在 1959 年完成民選的立法會，實行內部自治。

的。⁷¹ 因此，這些創始人的南洋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國中心的視角特徵。

郁達夫於 1938 年為逃避戰火南渡，在〈馬六甲遊記〉和〈檳城三宿記〉中紀錄旅途中所看到的地標和追述當地的歷史，不斷強調其異鄉人的身分，承載特殊時期的流離與抗爭。郁達夫的〈馬六甲遊記〉便是為了《南洋學報》創刊號所寫。遊記描繪自己在馬六甲參觀荷蘭殖民時期的建築和古蹟，最後參拜了明朝遺民所建的青雲亭和三寶殿。他闡述這些先輩的開荒史和偉績，結尾處以「中國人」的身分認可馬六甲為名副其實的古城。這篇遊記從陌生的異地景觀轉向熟悉的歷史人物，透過與先輩的跨時空對話，讓自己彷彿暫時擺脫了漂泊的孤寂，發出「簡直使人感覺到不像是在異邦漂泊的樣子」的感嘆，⁷² 著重點是抒發自己在異地對故土的眷戀。

然而，教科書的闡釋卻避談作者的情感寄託，而是側重於華人在馬來亞的悠久歷史，以此證明「我們在此土已種下很深的根苗了」，⁷³ 試圖重構文本的本土化意義。教科書也在註釋中詳細補充地景、植物和人物的背景知識，讓學生對當地有深刻的認識。

而另一篇〈檳城三宿記〉中，教科書同樣選擇性淡化了作者對歸國無望的孤獨與失落的感嘆，僅專注於文中對檳城景色的描述與讚美，並以此引導學生討論自己居住地的風景和印象。⁷⁴ 這種詮釋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在地認同，卻也遮蔽了文本的情感深度與歷史脈絡。值得注意的是，教科書在課文的「題解」中卻補充了郁達夫下

⁷¹ 李志賢，〈前言〉，收入李志賢編，《南洋研究：回顧、現狀與展望》（新加坡：南洋學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2 年），頁 vi。

⁷² 郁達夫，〈馬六甲遊記〉，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1967 年），冊 2 下，頁 116。

⁷³ 郁達夫，〈馬六甲遊記〉，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2 下，頁 118。

⁷⁴ 郁達夫，〈檳城三宿記〉，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1968 年），冊 3 上，頁 49。

南洋的經歷和路線，並附上其前往檳城所寫的詩：「故園歸去已無家，傳舍名留炎海涯；一夜鄉愁消未得，隔窗聽唱後庭花。」⁷⁵ 深刻揭示作者的家國之思與流亡心境，透露在思想情感上對「文化中國」的隱性在場，為「文化中國」的情感連結與「去中國化」的本土敘事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矛盾。

相比之下，1931 年南來的許雲樵在課本展現不同的知識取向。〈中國古籍中的馬來亞〉通過嚴謹的文獻考據，梳理中國與馬來亞互動的歷史脈絡，刻意規避「華族中心主義」傾向。許雲樵從歷史的角度追溯華人南下的淵源，同時參考日本學者的考證，指出他們的判斷與研究錯誤，以嚴謹的學術考證闡述馬來亞的史料，並提出佐證與意見，體現了他在南洋研究中對歷史的真相與文化根源的追求。其學術散文獲得教材的採納，保持了客觀性特質，成為培養學生歷史認知的文本。然而細究其論述結構仍可發現，文章本質上是通過中國從三國時期到明朝的視角來詮釋馬來亞的歷史面貌，包括對地名音譯的分析。⁷⁶ 這種研究路徑雖力求客觀，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史料框架的制約。許雲樵的學術實踐正體現本土認同與中國文化參照的辯證關係。他在方法論上試圖突破民族中心主義的侷限，卻又不得不依託中國古籍的知識體系來建構馬來亞的歷史敘事。教科書通過設置「為什麼過去學者對中國古籍中的馬來亞史料不加注意？」的問題引導學生關注中國文獻的學術價值，又暗示單一史料的局限性。這種敘事和教科書的編纂深刻反映本土進程中的結構性悖論，當本土敘事試圖掙脫中國中心主義時，往往需要借助中國傳統的知識資源來完成自我界定。

同樣的情況也體現在謝冰瑩（1906-2000）的〈太平山遊記〉與

⁷⁵ 郝達夫，〈檳城三宿記〉，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3 上，頁 41。

⁷⁶ 許雲樵，〈中國古籍中的馬來亞〉，《華文》（新加坡：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1962 年），冊 4 下，頁 88-93。

其他課文的並列中。謝冰瑩於 1958 年赴馬來亞太平華聯中學任教，並於 1961 年返回臺灣，出版了《馬來亞遊記》。這篇散文集也成為第一部由民國作家撰寫的馬來亞散文遊記。〈太平山遊記〉正是謝冰瑩在執教期間，到太平山遊玩的紀錄。她不僅描繪了太平山的自然景觀，也展現了馬來亞殖民文化與多元社會的風貌和獨特性。在她的筆下，西餐的菜色比中餐更為豐富，透露出殖民文化的遺留，反映了殖民時期飲食文化的影響。而她與同伴們沿途經過的印度廟和印度村落，勾勒出馬來亞多元社會的獨特風貌。此外，她還紀錄了同伴與當地老人以馬來語溝通的經歷，反映馬來語為國語的政策背景下，該語言已成為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之間的溝通橋樑。然而，《華文》在編排上將〈太平山遊記〉與一系列中國古代與現代遊記並列，包括孔貞瑄（1634-1716）〈日觀峯觀日出〉、老舍（1899-1966）〈趵突泉的欣賞〉和劉鶚（1857-1909）〈大明湖〉。這些遊記分別闡述了中國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觀與文化特色，模糊了〈太平山遊記〉「去中國化」的教育目的。這種並列編排，雖也屬為文體比較的教學功能，實則隱含了一種「文化中國」的敘事回歸，體現了文化認同的延續性。《華文》一方面透過南洋書寫培養學生的在地認同，卻又透過文本選擇與並列方式，隱形地強化了「文化中國」的連結。

（四）友聯成員的「引導性策略」本土認同

《華文》也運用編輯的權力，收錄了友聯成員在馬來亞創作的作品，以此強化本土認同的教育目標。《華文》冊 3 上便以〈馬來亞之歌〉的兩首詩為開首。這些詩作在取名和內容上都充滿對馬來亞的熱愛和認同。〈馬來亞黎明〉和〈我愛馬來亞〉的創作者分別是薛洛和姚拓（1922-2009）。值得一提的是，〈馬來亞黎明〉曾發表於

《蕉風》第 10 期，而薛洛實際上是創辦人陳思明的筆名。他在創作這首詩時，雖在馬來亞居住不到一年，卻以激情的筆調描繪華人在馬來亞的開拓史和對獨立的期待，代表世代居住於此的華人發聲，成為在地人的精神引領者。以下為〈馬來亞黎明〉的詩供參考：

雞聲啼破了長夜的睡夢，
遠山還牽著朦朧的暗影，
稀零的小星仍戀著修長的椰樹，
——這是馬來亞的黎明。

我們多少代
披著星光在開拓這塊土地，
我們多少代
在這塊土地上盼望著天明。

椰樹可說得出
是多少血汗；
遠山可記得清
是多少辛勞和熱情；
使蠻荒的山芭變成蔥綠的園圃，
使寂冷的沙灘變成現代的市城！

這塊土地的命運，
已成為我們共同的命運。

這片天空的陰晴，
也就是我們共同的陰晴。

「猛得革」的聲浪，
衝破了長夜的睡夢；
爭自由的熱血，
在每個人胸中沸騰。

多少代——
我們在滴下血汗；
多少代——
我們在盼望：
馬來亞的黎明，
馬來亞的黎明！⁷⁷

作者透過「雞鳴」、「遠山」、「暗影」、「椰樹」和「星星」等意象勾勒黎明時分的景象與聲音，以此寄託對馬來亞邁向獨立的期盼。同時，反覆出現的「多少代」一詞，強調了當地華人在馬來亞開拓的時間跨度之長，以及他們與這片土地的命運聯繫。「披著星光」則生動展現了華人辛勤勞作的場景，表達了他們「使蠻荒的山芭變成蔥綠的園圃，使寂冷的沙灘變成現代的市城」的歷史貢獻，刻畫他們與居住地之間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關係。林春美指出這首詩在感性的地方認同背後，藏著理性的「勸諭」，提醒讀者在務實的情況下做出國籍的抉擇。⁷⁸

而賀淑芳則表示作者的馬來亞本土書寫是參照先輩描述南洋的修辭和既有觀點，建構對馬來亞自然本質的想像以「實行『去中國化』的本土書寫，將『居住之地』構塑成可被認同的『歸屬之地』」。⁷⁹《華文》對詩作的題解和主題介紹則以「黎明」象徵新生和覺醒，並以規勸的方式改正華人「僑居作客」的心理，呼籲他們成為土地的「主人」。這種「主人」的心理實則指向對馬來民族作為土地之子（Bumiputera）的回應，表達了各種族在新興國家中應享有平等地位的願景。因此，〈馬來亞黎明〉不僅是歌頌馬來亞的獨

⁷⁷ 薛洛，〈馬來亞黎明〉，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3上，頁1-3。

⁷⁸ 林春美，《《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頁55。

⁷⁹ 賀淑芳，《《蕉風》創刊初期（1955-1960）的文學觀遞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頁75。

立，更強調華人在當地的貢獻與重要性，表達「公民」意識的覺醒。教科書的問題討論也引導學生思考「僑民」和「公民」的區別，幫助他們認識身分認同的轉變及其社會意義。但更有意思的是第二道問題：

在過去二百年的期間，歐洲，特別是英國的移民，在新大陸建設了一個世界上一等的強國——美國，他們自始便把自己看作是那個新國家的「主人」。然而，我們華人來到馬來亞已不只二百年，但在獨立以前，多數人一直把自己當作「客人」，稱為「僑民」。這是什麼原因？影響怎樣？⁸⁰

這道問題將視野拓展至太平洋，把馬來亞移民與美國移民進行比較，促進學生深入思考本土認同對自己和居住地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教科書選擇以美國作為正面的例子與強國論述的參照，隱含著軟實力的灌輸和認同，具有隱藏性的冷戰思維。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其文化、經濟與政治模式被視為現代化的典範。《華文》透過將馬來亞與美國並置，試圖傳遞一種具有指向性的現代化價值觀，並以此激勵學生思考本土發展的方向。

（五）本地作家的馬來亞敘事

《華文》收錄的本土色彩課文中，魯白野（1923-1961）和吳進（1918-2003）是少數幾位真正出生於馬來亞的學者與文人。魯白野生長於馬來亞霹靂州怡保，是土生土長的本地學者。吳進則為「九葉詩派」詩人杜運燮的筆名。他雖出生於馬來亞霹靂州實兆遠，但因初中畢業後即赴中國求學，在中國文壇成名，故戰後重返新加坡

⁸⁰ 薛洛，〈馬來亞黎明〉，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3上，頁5。

教書時，被誤認為是南來文人。⁸¹ 這種身分認知的錯位，恰恰反映了戰後新馬華文文學場域中「本土」與「南來」界線的模糊性。通過比較本地作者和非本地作者對本土書寫的課文，教科書弔詭地以他者的本土書寫實行「去中國化」的引導，卻用本地作者的作品捍衛中國中心論，體現了文化認同的複雜性與矛盾性。魯白野撰寫的〈馬來亞民族英雄漢都亞〉是根據馬來文學經典《漢都亞傳》（*Hikayat Hang Tuah*）講述馬來武士漢都亞的英雄事蹟。然而，作者在提到漢都亞出使中國，寫道「回來後對天朝繁華念念不忘，逢人便說中國好」。⁸² 這一情節並未出現在《馬來紀年》和《漢都亞傳》中。《漢都亞傳》雖記載漢都亞出使中國，卻沒有回來宣揚。魯白野特意添加漢都亞對中國的讚美，隱含他對中國昔日繁華的優越感與文化認同。儘管魯白野出生於馬來亞霹靂州怡保，卻展現「遠端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的特徵，嚮往原鄉的神話和昔日的繁榮。

另一篇課文〈談馬來亞的歷史〉以去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重寫「題材正確」的馬來亞史。作者追溯中國與馬來亞的歷史淵源，指出中國史書記載了馬來亞的州屬向中國朝貢或通商的史略，並批評這些史料並未被充分運用和發展。⁸³ 然而，從去西方中心主義到以中國為本位的史書論，仍是從他者的視角重構歷史。作者將馬來亞的繁榮歸功於華人移民的開荒史，表示從古代至現代，華人都應該有責任「寫成一部更客觀的、正確的、沒有偏見的馬來亞史」。⁸⁴

⁸¹ 林萬菁將杜運燮列為 1945 至 1948 年南來的中國作家，遺漏他為土生土長的馬來亞人。詳情可參考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 年），頁 107。

⁸² 魯白野，〈馬來亞民族英雄漢都亞〉，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1961 年），冊 1 上，頁 133。

⁸³ 魯白野，〈談馬來亞的歷史〉，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1 下，頁 41。

⁸⁴ 魯白野，〈談馬來亞的歷史〉，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1 下，頁 42。

〈談馬來亞的歷史〉原收錄於魯白野的《馬來散記》。張松建指出該書通篇以「離散華人」為歷史主體，將馬來亞史等同於華族史，體現了「一部馬來亞現代史就等於一部馬來亞華僑史」的「華族中心主義」主題。⁸⁵ 然而，教科書對課文的闡釋有意消解「華族中心主義」的激昂論述，強調要以馬來亞民族本位的立場認識馬來亞歷史，讓學生思考歷史保存的重要性和馬來亞歷史的輪廓。⁸⁶ 這種編輯策略，即反映了對本土認同的追求，也揭示在「去中國化」與「中國中心論」之間的拉鋸與分化。

吳進的〈熱帶三友〉收錄自其散文集《熱帶風光》，被認為是第一位對馬來亞風土進行有系統的書寫，並且具有相當的藝術水平。⁸⁷ 他創作於華僑中學「虎豹樓」宿舍，將「歲寒三友」的松、竹、梅意象轉化為熱帶地區的植物書寫，即椰子、芭蕉和木棉。〈熱帶三友〉為作者以歲寒三友的比喻轉化為當地的熱帶三友。文章多處彰顯中國文化，是作為馬華文學史上的吳進與中國九葉詩派成員杜運燮的雙重身分在文本中形成微妙對話，一方面延續中國詩學的探索，另一方面積極介入馬來亞的本土題材。〈熱帶三友〉中對中國文化的顯性徵引與對熱帶植物的細膩描繪相互交織，創造出獨特的文化雜糅文本，不僅反映個人身分的雙重性，更象徵冷戰初期東南亞華文文學中「文化中國」與「在地意識」的創造性融合。通過對照兩個文學身分及其背後的文化脈絡，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熱帶三友〉如何成為跨越地理疆界與文化藩籬的美學實踐。

⁸⁵ 張松建，〈「族群」與「國祖」的變奏：重探魯白野的文化——政治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第29期（2016年6月），頁122-123。

⁸⁶ 魯白野，〈談馬來亞的歷史〉，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1下，頁44。

⁸⁷ 鍾怡雯，〈杜運燮與吳進——一個跨國文學史的案例〉，《國文學報》第51期（2012年6月），頁224。

（六）《華文》教科書的「居間身分政治」與「第三空間」

綜上所述，《華文》雖然遵照教育部的本土認同的課程標準，但教材的選篇和編排卻刻意與「去中國化」政策保持策略性距離，呈現一種混雜性的「第三空間」。編撰策略實際上也反映編輯試圖維繫「文化中國」的象徵連結，形塑學生對「文化中國」的離散認同。這種認同既非完全依附中國，亦非徹底同化於在地，而是霍米·巴巴所謂的「第三空間」，即一種在冷戰地緣政治後殖民情境中協商出的混雜文化身分，同時也是抵抗單一意識形態的收編。《華文》透過「題解」、「註釋」、「分析」和「問題」等欄目展開「文化中國」與本土意識的隱形協商，通過史料的補充引起學生對閱讀中國古籍的興趣，並在比較馬來亞遊記和中國的遊記中保留「文化中國」的情感連結。

與此同時，《華文》收錄薛洛和姚拓的馬來亞詩作，則體現友聯的「居間身分政治」。這種身分的流動性呼應了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所提出的離散身分概念，表示文化身分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流動與變化中不斷協商。⁸⁸ 但這種本土認同卻是有意識地策略性建構，構成有選擇性的「華人性」，既服務於冷戰和本土意識形態的需求，也試圖為華人爭取文化生存的合法性。

五、結論

本文透過對檔案資料的解析與挖掘，探討文化冷戰背景下美國與亞洲知識分子所創辦的文化機構在合作之間的權力關係辯證，發現儘管當地知識分子在經濟上受到美方的支配，卻在實踐中展現能

⁸⁸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s.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394.

動性，並非完全受美方的掌控。通過填補友聯的教科書出版事業的研究空白，本文揭示友聯南下馬來亞出版教科書的背後，涉及另一層美援的合作關係，屬於美國在東南亞推行教育計畫的戰略之一。

教育在文化冷戰研究中的長期缺席，忽視了當地政府的角色以及更為複雜的權力動態與能動性。沈雙在研究友聯《中國學生周報》在東南亞的改版和信息的傳播時指出，亞洲基金會「多重地址」的狀態下無法完全控制其他網絡的運作。這種權力的分散與流動性，使得冷戰的文化宣傳為東南亞的創造了基礎設施和資源，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文化結果，進而構成冷戰時期「華人性」的話語生態。⁸⁹

而《華文》教科書正是在這一複雜權力關係與文化策略下的產物。它不僅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外交的工具，更是友聯在東南亞本土化實踐中調整身分認同的策略性實踐。通過教科書中本土書寫的選篇及其與其他文本的排列與詮釋，《華文》展現了「去中國」與「文化中國」的辯證關係，揭示了文學教育在體制化結構中如何成為既順從與抵抗的角力場域。同時，友聯在地緣政治的牽制下，策略性地維繫學生與「文化中國」，即傳統文化、拉近學生與中國的情感連結，使得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的「華人性」身分長期處於動態、持續且充滿爭議的建構過程中。這種文化結果已超越冷戰的意識形態鬥爭，成為海外華人對文化身分的不斷探索與調整。

（責任校對：黎思行）

⁸⁹ Shen Shuang,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606.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友聯出版社圖書目錄》，香港：友聯出版社，1960年。

方美富，〈蕭遙天與五八年「華文」課本誕生〉，《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21期，2018年9月，頁43-72。

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新加坡：萬里書局，1974年。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23-158。

白垚，《縷雲前書》，上冊，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6年。

李志賢，〈前言〉，收入李志賢編，《南洋研究：回顧、現狀與展望》，新加坡：南洋學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2年，頁v-xi。

李樹枝，〈升起現代文藝的大纛：《蕉風》、余光中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收入張錦忠、黃錦樹、李樹枝編，《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2年，頁259-274。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

林春美，《《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

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年。

柯思仁，〈想像馬來亞，操演多元文化：五〇年代新加坡華文知識界的馬來亞意識〉，《人間思想》第1期，2012年7月，頁170-190。

崔貴強，《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修訂卷）》，新加

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

張松建，〈「族群」與「國祖」的變奏：重探魯白野的文化——政治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第 29 期，2016 年 6 月，頁 119-138。

張從興，〈「華人」「華語」的定義問題〉，《語文建設通訊（香港）》第 74 期，2003 年 6 月，頁 19-25。

張錦忠，〈亞際華語圈的文學流動：論《蕉風》與臺馬文學關係〉，《中山人文學報》第 52 期，2022 年 7 月，頁 1-17。

曹淑瑤，〈1950 年代馬來亞的華校學生運動之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2013 年 6 月，頁 307-339。

莊華興，〈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6 年 4 月，頁 7-30。

許經田，〈典律、共同論述與多元社會〉，《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2 期，1992 年 7 月，頁 19-34。

許維賢，〈文化冷戰中的「隱形宣傳」：論友聯出版社與《蕉風》在新馬的經營（1955-1970）〉，《二十一世紀》第 193 期，2022 年 10 月，頁 120-141。

——，〈亞洲基金會在新馬的文化冷戰：以友聯出版社和《學生周報》為例〉，《中外文學》第 52 卷第 2 期，2023 年 6 月，頁 65-113。

——，〈華語語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智強和陳子謙的電影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23 期，2013 年 6 月，頁 83-109。

章星虹，《星州星光：現代旅人手記》，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6 年。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第 174 期，2019 年 8 月，頁 67-82。

賀淑芳，《《蕉風》創刊初期（1955-1960）的文學觀遞變》，新加

- 坡：南洋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
-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 年。
- 新社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纂，苗秀編選，《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理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 年。
- 萬恆德、騰碧城編，《中學語文教學概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
- 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 年。
- 趙稀方，〈五十年代的美元文化與香港小說〉，《二十一世紀》第 98 期，2006 年 12 月，頁 87-96。
- 盧瑋鑾、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冊 1，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賴美香，〈美援文化下的馬來亞華文出版界——以五、六零年代友聯出版社為例〉，《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0 期，2017 年 9 月，頁 119-141。
- 謝川成，《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1959-1989）》，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9 年。
- 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檳城：韓江學院，2009 年。
- 鍾怡雯，〈杜運燮與吳進——一個跨國文學史的案例〉，《國文學報》第 51 期，2012 年 6 月，頁 223-239。
- Bhabha, Homi K.,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 _____. "The World and the Home." *Social Text* 31/32 (1992): 141-153.
- _____.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Hack, Karl.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old War: Malaya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0.3 (2009): 471-496.

-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ted by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392–403.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 Lu Xun.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1949–1960: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117–14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hen Shuang.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69.3 (2017): 589–610.
- Strange, Susan.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 Wang Gung-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In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118–127.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81.

二、報刊文獻

- 〈中學採行「四二」制後華校教總極關注日內或會發聲明〉，《南洋商報》（1961年10月7日），第5版。
- 〈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各科小學課本年底全部出齊〉，《南洋商報》（1960年9月23日），第15版。
- 〈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精良課本・供應華校採用新加坡分公司編公民及倫理課本〉，《南洋商報》（1959年12月3日），第7版。
- 王延芝，〈漫談「周報」和友聯〉，《星島日報》（1988年11月1日），第10版。
- 燕歸來，〈向西飛行——「玻璃幕」之一〉，《祖國》第22卷第4期

(1958 年)，頁 27-29。

燕歸來，〈黑白分明——「玻璃幕」之五〉，《祖國》第 22 卷第 8 期
(1958 年)，頁 26-29。

三、網路資料

Wisner, Frank G. “Memorandum for: Project Review Committee (Subject: CFA budget for FY-195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TPILLAR*, vol. 2_0034, 1954, 4. https://archive.org/details/DTPILLAR%20%20%20VOL.%202_0034/, accessed March 5, 2025.

四、檔案

Asia Foundation. “A Trip to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6/57; MS no. P-57,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Hong 2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Approved Project.”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Attacks on the Union Press.” 1958/59; MS no. P-172, MEDIA Publishers Union Press General, Hong Kong,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Contract of Agreement.”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 Asia Foundation. "Conversation with some Union Press Friends from Singapore." 1957;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 Asia Foundation. "Hong Kong Meeting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1956/57; MS no. P-57,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Hong 2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 Asia Foundation. "Proposal for Publication of Textbooks for Chinese Schools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 Asia Foundation. "Textbooks for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 Hu Chia-chien, to Patrick Judge. "Letter from Chia-Chien Hu to Patrick Judge." 1958; MS no. P-135, MEDIA Press Malaya Press Chinese Textbk – 1958, Program, Malaya/Singapore 225,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 Malaya Press Ltd. "Summary of Progress of Malaya Press Ltd Textbooks Programs." 1956–1963; MS no. P-322, Union Press Organization, General Review,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 USIS/ICA/TAF. "Summary of Discussion-Coordination Meeting USIS/ICA/TAF." 1956/57; MS no. P-57,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Hong 2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Yen, Maria, to Robert Clarke. "Letter from Maria Yen to Robert Clarke." 1958; MS no. P-169, Yen Maria, Hong Kong, Individual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Yu Tak-foon. "Excerpts from Mr. Yu Tak-Foon's Letters from Singapore (translation)." 1957; MS no. P-57, MEDIA Publications Chinese Student, Hong Kong,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五、教科書

宋雲彬、朱文叔、蔣仲仁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年。

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1 下，新加坡：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1965 年。

_____，《華文》，冊 4 上，新加坡：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1962 年。

_____，《華文》，冊 4 下，新加坡：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1962 年。

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華文》，冊 1 上，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1961 年。

_____，《華文》，冊 2 下，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1967 年。

_____，《華文》，冊 3 上，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1968 年。

The Dialectic of “De-Sinicization” and “Cultural China”: Literary Education in the Malaya Press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Cold War

Yoke-Kuan W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literary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hinese-language textbooks published by the Malaya Press in 1960s Singapore. It investigate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Hong Kong’s Union Press and educator Hu Chia-chien, supported by covert funding from the U.S.-based Asia Foundation, to create a “non-communist” textbook publishing network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 Established in 1959, the Malaya Press became the sole “non-leftist” publishe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in Malaya. Despite the widespread use of its textbooks, the literary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have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in current scholarship. By analyzing literary works that adhered to the Education Ministry’s “localization” guidelin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urriculum not only addressed local educational needs but also subtly advanced a vision of “Cultural China.” On the basis of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Asia Founda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 textual analysis of Malaya Press’s textbooks,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cultural producers navigated 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external funding limitations to create a “third space” of knowledge

*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duction, allowing for a reconfiguration of “Chineseness” through pedagogical strategies that balanced anti-communist agendas, localized identity-building,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imaginaries.

Key words: Union Press, Malaya Press, Chinese-language textbooks, Cultural Cold War, Cultural China, literary education